

全域临空包容发展阳民制度资本理论系列丛书

制度企业家 与城镇化发展

ZHIDUQIYEJIA

YU CHENGZHENHUA FAZHAN

周阳敏●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全域临空包容发展阳民制度资本理论系列丛书

制度企业家 与城镇化发展

ZHIDUQIYEJIA

YU CHENGZHENHUA FAZHAN

周阳敏●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企业家与城镇化发展 / 周阳敏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36 - 4160 - 9

I. ①制… II. ①周… III. ①企业制度—关系—城市化—

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279. 21 ②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0861 号

责任编辑 张利影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巢新强

封面设计 华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艾普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42.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5416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88386794

前 言

2014 年被广泛地认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元年”，习近平（2015）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涉及面很广，要积极稳妥推进，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大中小城市有不同要求，要明确工作重点。推进城镇化不是搞城乡一律化。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潜力巨大，要加快改革和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李克强（2015）指出，2015 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既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三个 1 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同时，李克强提出将新型城镇化与制度红利联系起来（2013a），通过简政放权释放制度红利（2013b）。贾康（2014）认为应开放倒逼改革而激发制度红利。通过放松管制、引入竞争等释放制度红利（孙立坚，2014），人们已看到，中国经济改革转型为增长带来巨大红利（赖明勇，2014），新设的自贸区也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最大制度红利（张汉林，2013）。李强（2013）承诺浙江从更高水平上改善“制度供给”，更多地让企业获得制度红利。吴晓灵（2012）指出创造制度红利的着力点在反腐等方面。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2011）也呼吁用制度红利来增强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等。

所谓“制度红利”，就是通过制度变迁有效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即制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当前研究制度红利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概念与内涵的论述，如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2012）认为制度红利就是要减少审批，完全遵从市场规则；二是制度红利的影响，如吴敬琏（2012）认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史晋川（2012）指出浙江经济10年高速增长，从内因来看，主要得益于浙江历史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及制度创新红利。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康芒斯、凡勃伦、米切尔，或是科斯、诺思、德姆塞茨、威廉姆森等，都认为制度非常重要，T. W. Schultz 将制度放进人力资本投资与人的经济价值之中，习近平（2013）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作为抑制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随机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Wolfgang Kasper, 1998）被人们广泛研究，例如，制度是增长的关键（Geoffrey M. Hodgson, 2012）；产权制度是国外直接投资的领先指标（Fathi A. Ali 等, 2010）；制度质量对国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性影响（B. G. Buchanan 等, 2012），制度创造了机会与增加了激励（Stephen K. Wegren, 2012），等等。此外还有非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决定因素（Williamson, 2009）；非正式制度对转型经济中的技术变革产生重要作用（Brigitte Granville 等, 2010）；非正式制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风险规避机制（Liesbet Steeret 等, 2010），等等。

如果资本的报酬是资本对产业贡献的反应，那么与制度红利对应，必然要对制度资本及其所有者进行追溯，但制度资本的研究很少，主要是制度资本概念介绍，如 Rudi Bresser 等（2003）提出制度资本由认知资本、规范资本和规制资本组成；Gwendolyn Hallsmith 等（2011）定义制度资本为确保社会运行的结构、组织、法律和金融框架。对应制度资本，也有学者研究制度成本，认为制度成本只不过是某个实现了的博弈均衡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汪丁丁, 1995）；也有人认为制度成本是由政治风险、文化距离、语言距离以及分公司的集聚程度、地理位置和经营规模等形成的（M. Demirbag 等, 2007）；还有人认为制度成本就是社会在形成这种信息时所需要的费用（李建德, 2000）；而张旭昆（2007）则认为制度成本是制度创立过程中的成本和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成本。还有学者研究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制

度成本，包括制度发展、制度距离和制度活力（Sushil Vachani 等，2009）等。周其仁（2010）指出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才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正是因为如此，将制度成本转变为制度资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制度企业家，并认为制度变迁依赖制度企业家之间的合作，而制度建设中起巨大作用的就是制度企业家之间以及制度企业家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作用（Franciska Rosen 等，2012）。制度企业家通过创造市场和政治机会而部署资源和调整战术，从而改变产品边界等（A. L. Wright，2012），制度企业家甚至还建构先进、良好的制度体系（Favourable Institutional Set）以确立不可挑战的市场地位（Felipe Almeida 等，2014）。还有学者提出制度企业家能宏观上改变国家的创新系统，从而影响产业的成功或失败（S. C. Hung，R. Whittington，2011），微观上改变创新系统的功能，共同创造学习与知识，升级企业家精神，扩展创新经纪人等（Frans Hermans 等，2013）。

经笔者调查发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民营企业（城镇化的主体）的制度企业家（城镇化的主角）通过制度经营（城镇化的独特新商业模式与新路径）形成制度资本（城镇化的新资本形态）的过程。为此，必须纠正城市化的方向（郭克莎，2003），改变不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黄守宏，2011），摒弃严重市场功利主义倾向的城镇化（胡存智，2013），改革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城镇化（杨开忠，2013）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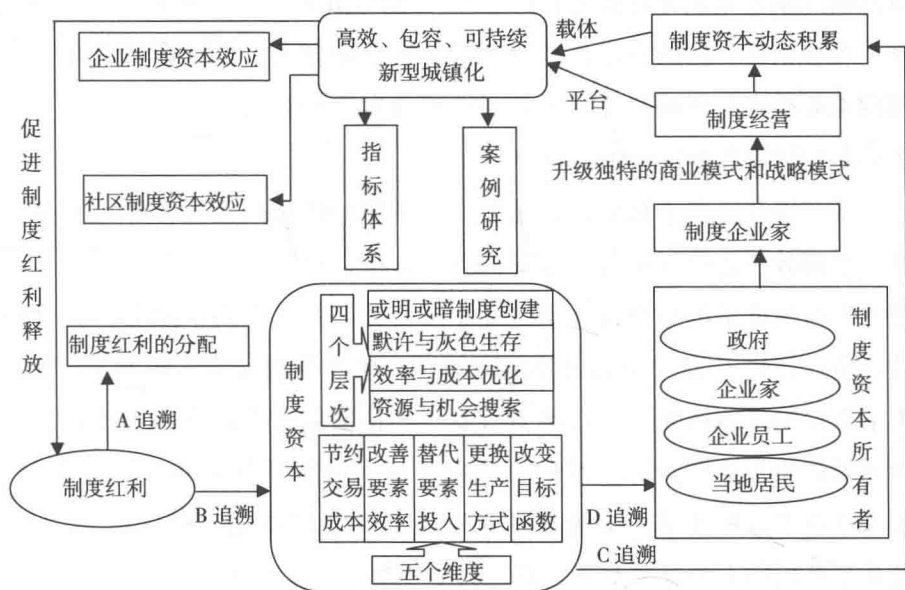
人们已达成了城镇化左右中国未来发展（贾康，2013）的共识，是提振宏观经济的方式（吴晓求，2013），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牛凤瑞，2012），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新动力（袁志刚，2012）；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目标推进的重要环节（顾海英，2013），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党国英，2010），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心环节（陈澍，2012）。因此，中国应走低碳城镇化路线（朱玲，2013），重视工业、制造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裴长洪，2013），以产业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韩保江，2012），协调业、城、人之间的关系（薛维君，2010），实现产

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慕海平，2013）和农民市民化（孙自铎，2013）。新型城镇化一定要让农民转化为市民，有效减少城乡差距（李实，2013），充分关注就业（李平，2012），享受住房、学校、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刘尚希，2012）。但 Xueyuan Tian（2014）认为人口城镇化极大地受到中国改革的深度、范围与进程的影响。

学者们指出将产业转移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根本措施（陈永杰，2013），走融资市场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钱颖一，2013），完成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空间布局的三大历史任务（夏斌，2013），创新城镇化及其道路理论（简新华，2010）等。

为此，本书以制度企业家理论作为贯穿制度红利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以制度红利的追溯为逻辑起点，以制度资本为核心概念，以制度企业家为思考中心，以新型城镇化为理论研究的落脚点，研究了新型城镇化的新资本形态（制度资本）、新商业模式（制度经营）、新作用路径（制度资本更新）、新动力机制（高效）、新平衡机制（包容）、新推进措施（可持续）等。本书以经济增长为视角，从制度红利的微观诞生之谜沿两个方向追溯（见下图），一是沿 A 追溯制度红利的分配，二是沿 B 追溯制度红利之源——制度资本，探究制度资本的本质、层次与维度；接着再沿两个方向追溯，一是沿 C 追溯并建构制度索罗模型探究制度资本的动态积累路径，二是沿 D 追溯制度资本的所有者，并探寻企业家制度资本的组成、形式与作用机理，研究形成制度资本的制度经营的独特商业模式与策略，发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既是制度资本动态积累的载体，又是制度经营的平台等。通过对制度红利与新型城镇化深层机理研究，完善制度资本的理论及其应用，致力于推动理论创新，为现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此，本书将研究内容确定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企业家理论。包含第一章和第二章。其中，第一章研究中国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现实必然性和理论必然



制度资本、制度红利与高效包容新型城镇化的逻辑图

性，制度红利和新型城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制度红利和新型城镇化的新科学问题，尤其是研究贯穿制度红利与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主线——制度企业家理论——诞生之源。第二章研究了基于企业家特质的“企业家制度资本”的构成（地缘资本、认知资本、素养资本、政治资本等），着重研究“企业家制度资本”通过“制度资本”的四个层次和五个维度对企业绩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作用机理、作用路径和作用方式等，同时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基于制度企业家理论的新型城镇化机理研究。包含第三章、第四章内容，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其中第三章重点研究作为创造中国制度红利的重要手段、企业家制度经营关键平台与制度资本动态积累核心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性质，包括新型城镇化的新资本形态（制度资本）、新商业模式（制度经营）、新作用路径（制度资本更新）、新动力机制（高效）、新平衡机制（包容）、新推进措施（可持续性）等。第四章则以大量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 73 个社区的 551 个居民样本，

重点研究新型城镇化对解决农村空心、“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邻里关系、社会信任、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的重要模式与影响路径，尤其讨论外部制度经营与内部制度经营所产生的新型城镇化制度资本效应等。

第三部分，基于制度企业家理论的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与制度变革。本部分包含第五章与第六章内容。其中，第五章首先分析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指标设计，重点评估了73个社区样本的高效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这既是本书理论创新的研究，也是本书重要实用价值的研究，有助于评估发现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绩效考核以及对未来城镇化提供指导性指导。第六章重点分析了基于制度企业家理论的新型城镇化的基层制度变革，尤其是基层的土地制度变革、就业制度变革、治理制度变革，等等。

第四部分，基于制度企业家理论的新型城镇化案例研究。本部分包含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内容。这三章以新型城镇化的典型企业、典型社区为案例，深入研究、凝练和总结高效包容可持续新型城镇化的成功经验与理论升华。一方面，作为整个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理论研究提供现实支撑；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成果，向学界和实践部门介绍新型城镇化的阶段性启示。此三章内容既是本书的落脚点，也是本书点题的关键内容，这也是本书命名的原因所在。

参与本部分讨论的范海涛、裴春亮、李刚等，他们既是成功的商业企业家，也是成功的制度企业家。他们不仅转换了企业的经营战略，提升了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改变了基层的管理制度、治理制度、法律规范与社会制度，促进了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

第一章 | 新型城镇化的新科学问题

——制度企业家理论的诞生之源001

第一节 中国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的现实背景
和必然性.....001

第二节 制度红利与新型城镇化.....008

第三节 制度红利和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现状.....012

第四节 制度红利和新型城镇化的新科学问题.....021

第五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来源.....024

第六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028

第七节 本书的学术创新与学术价值.....030

第二章 | 企业家制度资本的来源、形式

与作用机理.....032

第一节 制度变迁、制度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理论逻辑
基础.....032

第二节 企业家制度资本的来源、形式、作用及其
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现状.....036

第三节 企业家制度资本的作用机理及实证检验……043

第四节 延伸讨论与建议……056

第三章 | 新型城镇化：制度经营与制度资本更新……059

第一节 制度企业家理论视角下新型城镇化机理的
逻辑框架……060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性质之高效、包容……064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性质之制度经营……068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性质之制度资本更新……070

第五节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点……073

第六节 延伸讨论与建议……075

第四章 | 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资本效应……081

第一节 新型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082

第二节 制度资本及其新型城镇化积累主体……083

第三节 新社区调研统计性描述……086

第四节 社区居民的制度资本效应分析……088

第五节 参建企业的制度资本效应分析……096

第六节 延伸讨论与建议……102

第五章 | 新型城镇化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制度企业家理论视角……104

第一节 建立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评估 体系的意义……104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107

第三节 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指标 体系的设计……110

第四节 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高效、包容、可持续性 评估……118

第五节 新型农村社区的高效、包容、可持续性评估……124

第六章 | 新型城镇化制度变革、制度资本与制度 企业家……133

第七章 | 制度企业家范海涛与新社区南李庄……147

第八章 | 制度企业家裴春亮与裴寨新村……157

第九章 | 制度企业家李刚与九龙山社区……168

参考文献……176

重要术语索引表……185

附 录

-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查问卷……187
-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社区调研……190
- 工商联社区居民问卷……195
- 社区调查问卷表……197
- 制度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200

第一章 新型城镇化的新科学问题

——制度企业家理论的诞生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2013）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26日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第一条要求是：“简政放权，推进职能转变，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最终释放制度红利。”随着政府高层对于制度改革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的密集表态，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的大讨论和深刻反思，其中不乏激烈的争辩和观点的交锋。在这场讨论中，主要是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之争。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还能继续支撑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吗？制度红利的内涵是什么？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又在哪里？中国产生制度红利有哪些手段和方式？这些问题在本章将会有有一个初步的回答，而其中内在的机制和逻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会有深入的分析。

第一节 中国从人口红利到制度红利的 现实背景和必然性

人口红利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而不得不转向制度红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现实背景和必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出口难的增强，收入差距的扩大，土地成本的上升，“中国梦”的提出和释放制度红利的必然性，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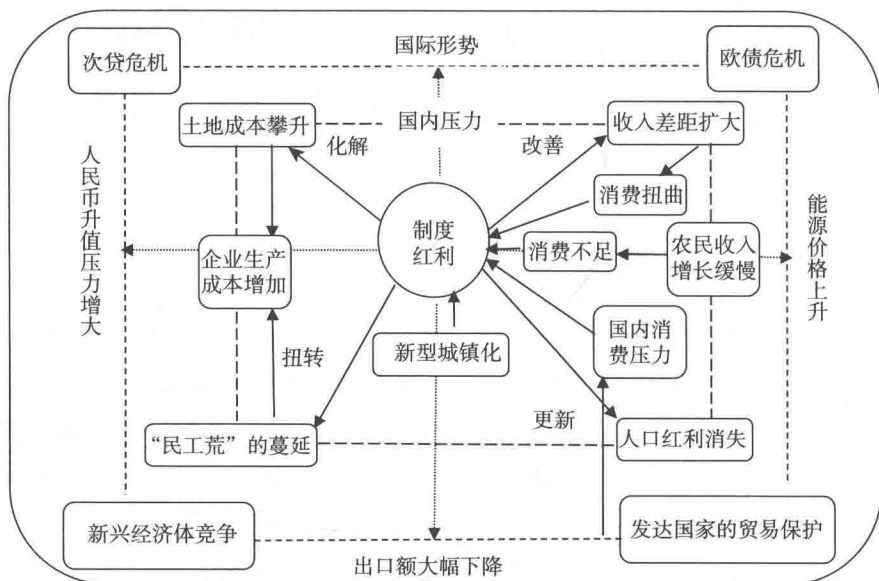


图 1.1 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现实逻辑

一、人口红利的消失

近期，“二胎政策”和“延迟退休”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两个话题背后都涉及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预测中国人口红利或于 2015 年消失的新闻，再次引发社会对人口红利的广泛关注^①。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2 年末，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 2011 年末减少了 345 万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佳鹏认为，每百名劳动人口供养非劳动人口的人数越低，就越有利

^① 专家激辩人口红利是否已消失 [EB/OL]. http://www.cs.com.cn/xwzx/hg/201307/t20130716_4067070.html.

于低成本开发丰富的人力资源,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就是人口红利^①。我国从1987年开始,这种劳动人口供养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到2012年达到了最低点30%,但这个比例的升高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根据陈佳鹏的研究,2011—2030年,将是我国劳动力最为丰富的时期,人口红利至少要到2034年才消失殆尽。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马芒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有一个过程,至少对于安徽省、四川省等劳务输出大省来说,在2020年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这些省份应该利用这个窗口期加快发展,为老龄化社会到来积累财富、储备人才^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不是人口结构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这两年宏观经济发展降速已无可辩驳地说明,廉价劳动力资源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供给了。他认为,事实上,我国人口红利已于2011年就消失了^③。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地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源泉终将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

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年儿童(0~14岁)占人口的比例从36.13%降低到16.6%,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从59.13%提高到74.57%,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的比重从4.14%上升到8.87%(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11)。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少儿

① 侯大伟,周亭玉,姜刚.人口红利或于后年消失 如何应对[N].解放日报,2013-08-22.

② “二胎政策”“延迟退休”是否现实?——专家激辩人口红利拐点[N].铜陵日报,2013-08-22.

③ 侯大伟,周亭玉,姜刚.放宽二胎能否延续人口红利期[N].中国青年报,2013-08-22.

抚养比以及总体抚养比的迅速下降，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个特征。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蔡昉（2005）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估算了人口红利对 1982—2000 年人均 GDP 增长率的贡献为 26.8%，同时预测，随着大约在 2013 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二胎政策”“延迟退休”对延缓人口红利消失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近些年来“民工荒”问题的爆发，也使我国失去了劳动力丰富且价格较低的相对竞争优势。所谓“民工荒”指的是民工短缺现象。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南方主要城市，并在春节期间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人力成本的上升，使耐克、阿迪等鞋业巨头纷纷将工厂从中国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印度、泰国等地。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中国出口难的增强

近些年来，影响波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主要包括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世界各国作为独立统一的经济体，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影响着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格局。出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业务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一）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出口经济的影响

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简称次贷危机，2006 年最先发生在美国，随后波及日韩和欧洲金融市场。2008 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也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住房市场的降温是其起因，利率的上升是其导火索，其直接后果是大批购房人因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放弃还款计划，从而造成的全方位的信贷危机。再加上美国房地产贷款的高度证券化，使得信贷市场危机不可控制地传导到金融市场，进而导致中小银行和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纷纷破产，相应的投资基金逐一